

大众传播与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知识图景^{*}

——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考察

连水兴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现实问题。不管是在社会学领域,还是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在研究“公民社会”时总是不可避免地论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和意义。而随着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也逐渐参与到这一重要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各种不同学科领域对此问题的共同关注,为大众传播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描绘了一幅广阔的知识图景。

关键词: 大众传播; 公民社会; 中国语境; 知识图景

作者简介: 连水兴,男,讲师,博士。(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350108)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1) 02-0042-06

一、公民社会：中国语境与术语的有效性

作为一个起源于西方历史经验、且自身有着极其复杂内涵和外延的术语,“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在中国学术语境里已经流行了相当长时间,并且衍生和建构出颇有影响的话语体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已经度过了艰难的理论磨合期,顺理成章地融入了中国的学术语境。就像戈登·怀特所说的,要把这样一个源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概念运用于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轨迹和社会特征的社会中,把它当作一种解读社会变迁的工具时,很可能出现某些问题。特别是当它卷入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作为理想化的反国家形象出现时,它必然降低自身在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分析上的价值。^[1]因此,在中国语境下考察“公民社会”这一术语的有效性,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由于东西方学术语境的差异,以及语言沟通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西方的学术术语被翻译到中国时,往往会发生不对称的现象。“公民社会”这一术语进入中国学术语境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由英文中的“civil society”翻译而来,在汉语界“civil society”有三种常见的译法: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2]这种跨文化语境下理解的不对称性,往往造成“civil society”在中外不同学术典范和运用中的分歧,给学术研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有必要在中国语境下对其各种不同译法及其适用性进行分析和阐释。

“民间社会”最初是历史学家们使用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一些民间组织,比如清末民初的商会、教会等等。在这些历史学者眼中,“民间社会”是一个中性的称谓,同时也隐含着与“官府”相对应的边缘化色彩。与大陆学者的理解有所区别的是,台湾学者强化了“民间社会”与“官府”之间的对抗关系。比如,南方朔、木鱼、江讯等一些台湾学者将“民间社会”直接作为 civil society 的中译名,并提出所谓“民间社会”理论,主张通过民间力量对权威统治持续不断的抗争来建立民间社会自主、自律的空间,从而形成一种“民间社会对抗国家”的关系架构。^{[3](55-99)}但这种过于边

^{*}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860019)的成果。

缘化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某种痕迹，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并不具备普遍性。^{[3](100-124)}因此，“民间社会”的译法在大陆学术界运用得并不是很普遍。

相对而言，将“civil society”译为“市民社会”有着更为丰富的历史和内涵。“市民社会”被视为一个分离于国家、与国家呈平行状态的范畴——即由市民依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结合而形成的领域，因此，市民社会只有在把政治国家当作自己的参照体系时才有意义。其显著特征在于，“它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非官方的社会结构和过程，诸如各种民间组织机构、非政府机构、中介组织、社会运动等均属于市民社会的范围”。^[4]如果从这个层面上理解，“市民社会”与后面我们所谈的“公民社会”，不管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许多研究中，不少学者都将“市民社会”等同于“公民社会”。

英国学者戈登·怀特曾对“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发展和演变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他指出：“从公民社会这一术语的大多数用法来看，其主要思想是，公民社会是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大众组织，它独立于国家，享有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它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5]因此，“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承接着以往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某些旨趣，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衍生和创新，因而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时代性。

在中国学术界，“公民社会”是“civil society”相对较新的译名。有学者认为，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八九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再者，就 civil society 的政治学意义而言，本来侧重的就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公民社会确实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6]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公民社会”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系统理论，又是一种社会研究基本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作为一种规范性与实证性研究并重的政治哲学，在对政治社会的专制权力进行强烈的社会批判的同时，以一种民主、平等与正义的政治理想形塑着文明社会的形态。”^[7]因此，本研究中更多采用的是“公民社会”这一译法。

二、大众传播与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发端

中国学术界关于“civil society”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以邓正来、俞可平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香港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大陆的《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他们除了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进行评介，还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以及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此后的20年间，伴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研究作为一个基本的议题，也随之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1992年，邓正来、景跃进两位学者共同发表了题为《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的论文，被认为是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滥觞。在这篇论文中，两位作者认为：中国市民社会乃是非官方的公域和私域的合成，其中非官方的公域是指在国家政治安排以外市民社会能对国家立法及决策产生影响的各种活动空间，比如在电视、广播、报纸、刊物、书籍等传媒中表达意见和观点，在沙龙、讨论会和集会中零散地面对面交换意见等等。他们认为，透过这些空间的活动，可以形成一种广泛承认的社会意见，即“公众舆论”。“它不是由国家或政府来阐释的，但对它们的活动产生影响。”^{[3](10)}应该说，这是中国学术界关于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研究的发端。

其后，在邓正来等学者的研究中，常常论及大众传播媒介在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甚至以相关的案例作为实证分析的起点。比如，1993年，邓正来在研究中国台湾地区的“民间社会”问题时，就发现，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台湾社会解严之后，“（国民）党外刊物、对权威体制进行批判的杂志和期刊，以及评介西方新兴思潮和思想的刊物逐渐增多，参与了公共领域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之争夺”。^{[3](55)}1996年，邓正来再次强调：“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并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形成过程。”^{[3](144)}2000年，邓正来发表了题为

《市民社会与国家知识治理制度的重构——民间传播机制的生长和作用》的论文，以北京的三家大型民营书店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对1949年以来国家知识治理和知识传播方式的转型做了历史性的考察。作者发现，从1949年到1980年代之前，国家在图书生产和流通方面采取了“统购统销”的方式，完全控制了知识的生产和成果的流通，并最终造就了一种对于知识流通的垄断性控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个体经营和民营化的出现和发展，以图书流通为核心的知识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发生了转变。“这使得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特别是后者——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发展成了市民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使之获得了‘特殊的赋值’，进而还使之体现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组织在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中的复杂互动关系。”^[8]同样是在2000年，中国学者康晓光也对大众阅读和图书出版做了类似的研究。康晓光认为，1978年以后，“政治气氛的日趋宽松和出版业的市场化改革带来了大众阅读和图书出版的巨大变化，政府对出版和公众阅读活动的控制能力在逐渐下降，而社会领域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在中国已经初露端倪。”这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已经在最敏感的领域引起了不可逆转的民主化效应。中国正在逐渐发育出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思想形成与传播的自治空间。”^[9]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图书和报刊出版为主要形态的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已经开始对中国公民社会产生影响了。

总体而言，从1990年代初到2000年的大众传播与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研究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其一，这些研究主要发生于政治学或社会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在研究公民社会的发展问题偶尔涉及传播媒介的内容，但在中国传播学研究领域则还没有出现自觉的研究；其二，这段时期，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学者只关注到传统的传播媒介，即图书、报刊等，以电子媒介或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很少出现在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中。

三、传播学领域对媒介与公民社会问题的认识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与善治的兴起，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制度创新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因与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相符合而更加兴盛。学者们开始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研究，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空间的建构及第三部门的发展进行切实的论证。^[6]与此同时，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关于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热点问题。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南京大学的王雄教授较早在中国语境下对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2002年，王雄出版了《新闻舆论研究》，在这部专著的下篇中，作者对西方的公民社会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以此作为理论构架探讨了“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与媒体角色”这一论题。作者不仅历史性地考察中国近现代以来各个时期的公共领域建构，而且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论证了大众传播媒介在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必然方向，是中国走向民主化和法制化社会的最显著标志，一个强大的、活跃的、参与型的公民社会将使国家更加负责任地行动。“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新闻媒体可以而且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具体来说，新闻媒体可以通过它的舆论诉求，培植人民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开辟社会权力话语体系之外的‘公共领域’，建立社会意见充分交流的‘公共空间’，防止国家权力对社会中的个人和社会组织之权利的侵害，在社会和政府之间建构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交流的平衡关系。”^[10]这无疑是对大众传播媒介建构公民社会功能的高度肯定，同时也是传播学研究领域自觉研究公民社会问题的表现。

2004年，在孙旭培教授的指导下，王勇撰写了题为《公民社会与新闻传播》的论文，对公民社会中的新闻传播活动进行宏观考察，并从传媒受众观、功能观、经济来源、传媒舆论和传媒控制等方面对公民社会下新闻传媒进行微观分析。论文指出：公民社会与新闻传播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一方面，

传媒能够培育公民意识,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引导公民舆论的动向,以及为公民代言并监督公民言行等;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对传媒的保护和制约作用,比如监督传媒,保护记者,经济支持等等。^[11]同年,陈赟也撰写了题为《试论“民生新闻”在构建“公民社会”中的作用》的论文,从一个更为细微的角度介入相关问题的研究。^[12]尽管其中的某些观点还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但这些年轻学子们对大众传媒与公民社会的理解仍不乏创见,也体现了当前学术研究的某种趋势。

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大众传播媒介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尽管已呈现了公民社会雏形,但是公民社会的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全民参与原则以及宪政原则等理念还远未被广大社会成员所认同,缺乏公民社会理念的传播和普及教育是制约中国公民社会形成和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没有媒体参与传播,这些与社会公正相关的公民社会理念的普及和走向成熟是不可想象的。^[13]也有学者认为,作为信息的传递者和社会环境的守望者,我国大众媒体应该尽其所能在建构中国公民社会中释放出高效能量。作为信息的主要发布者,在公民社会中它必须提供可靠的信息以供个人或单位决策参考;而人们公民意识的增强有待于媒体的因势利导和积极培养;在公民行动上,媒体应鼓励公民的合法行为,让他们积极投入到公民社会建设中。^[14]还有学者指出,要加快我国公民社会构建,必须大力发展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只有公民的媒介素养提高了,才能真正建成我们的公民社会。^[15]类似的观点,在近年来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屡屡出现,但总体上仍然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此外,新媒体的兴起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意义,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比如赵国臣认为,在网上每个网民既是始点也是终点,无论你是何种身份,无论是匿名还是实名,都有一个平等表达的机会和自我展示的权利。作为“网民”大国,这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理想契机。^[16]而孙少威、陈莉等学者认为,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传媒形式,具有公共性、民主性、自由性等特点,发挥好网络传媒的优势有利于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17]

加拿大传播学者伊尼斯曾经指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技术的出现,可能引发一种新的社会文明的产生。尽管这种说法不无夸张之处,但其所说的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学界的共识。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迅猛发展,也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也许就像前面的学者所说的,这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契机。

四、西方学术视角下的大众传播与中国公民社会建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的公民社会问题同样备受国外学者的关注,但由于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种种隔阂与偏见,使得围绕着这一问题产生的争论显得更为尖锐和复杂。比如,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和诺拉·绍斯米卡特就在《西方公民社会观适合中国吗?》一文中提出质疑,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出现了社会分化、利益重组以及利益代表的重构,但是公民社会以独立于国家的自治和独立于传统结构如家族、单位或家庭的自治为前提,涉及公民结构及其思维模式的形成等诸多因素,其形成条件在中国才显露征兆,中国现在还没有产生公民社会,把西方语境中的公民社会观援引到中国,可能会出现根本不适用的情况。^[18]对此,更多的中国学者则持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公民社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经验的事实。许多中国学者试图用种种事实和证据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高度政治化的中国社会外部开始渐渐地生长出一个相对独立的非政治领域,这也正是我们实证意义上客观认识到的‘公民社会’雏形。”^[19]

毫无疑问,中国语境下公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使得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这一问题的研究,不管是在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都带有更大的挑战性和复杂性。但是,这并不影响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热情关注。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唐(Tang, W. F.)的《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颇有代表性。这本专著研究了当代中国公众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对政治生态变迁所发挥的实际作

用,尤其关注的是发育中的中国公民社会对政治变革的驱动作用。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充分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当代中国,尽管媒体控制和出版审查还明显地存在着,然而,媒体多元化和消费的增长无疑提高了公众对媒体的信心,培养了公民主动参与意识、亲近西方感、政治效能感和公民社会价值观。^[20]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对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当然,对于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研究而言,不管“公民社会”这一学术术语,还是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大多是西方的“舶来品”。因此,许多中国学者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也对西方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状况进行了检视,并试图以此为当代中国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研究提供借鉴。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展江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值得重视。2007年,展江等人出版了一部80万字的专著《新闻舆论监督与全球政治文明——一种公民社会的进路》,该书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课题《世界各国新闻舆论监督体制研究》的最终成果。这本专著的出版对当前政治传播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公民社会的进路”,这不仅意味着“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理论框架被直接运用于政治传播的研究中,而且指明了“公民社会”可以成为当前国内外媒介政治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其二,该书作为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课题成果,隐含着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这一问题研究的认可和重视。在这本著作中,展江等学者以公民社会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为基本的研究框架,选择了二十余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对其公民社会发展状况、媒体发展水平、新闻舆论监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媒介与公民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全球性参照系。正如作者在考察某些处于转型期的西方国家的媒体时所说的,“转型则意味着民主的诞生,其间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经历着从无到有的变化,而且对中国有着充分的借鉴意义。”^[21]

还有许多学者在考察西方的大众传播及其管理机制时,也注意到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的问题。比如张天莉在研究西方电视传媒治理的结构与过程时,就将“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元结构作为分析的框架,对公民社会主导型的传媒治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指出,公民社会主导型传媒治理是在公民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模式,是以公民社会组织为主导的治理。这种模式的传媒治理追求公民社会的沟通自由,促成文化、意见的多元化表达。在公共利益的实现上,追求平等展现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创造自由沟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协调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其内外部治理中,公民社会组织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在治理过程中,注重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并接受其宏观调控,不排斥适度的市场运作。这种模式治理下的传媒主要通过社会机制向社会提供传媒产品,包括各种非国营的公共服务媒体。^[22]显然,考察西方大众传媒与公民社会发展的关系,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传媒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如何协调其与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及日益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研究视角。

五、当代中国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研究的缺陷及其发展空间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发展的研究,主要建立在以下两个现实基础之上:其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的萌发并逐渐发展,使关于公民社会的研究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并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其二,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不仅在技术层面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在制度空间层面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扩展和开放,尤其是计算机网络在中国的普及和运用,使得大众传播媒介进一步地成为影响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学术研究层面看,当代中国的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历程。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关注到这个命题;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传播学研究者则

自觉地介入这一命题的研究。但总体来看,中国学术界关于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还处于一个初步发展阶段,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水平本身就与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这必然反映在学术研究上的滞后;其二,与西方国家相比,尽管中国的大众传媒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在体制管理等方面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尤其是来自政府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管制,使得媒介的“公共性”属性常常受到质疑,因而难于与“公民社会”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建立关联性;其三,在当代中国的学术领域中,传播学本身还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其大部分的理论来源于西方,自身发展水平有很大的缺陷,尤其是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而这恰恰是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研究所迫切需要的。

从我们所考察的文献中可以发现,当代中国学术界关于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的研究,不仅数量不多,质量上也乏善可陈,缺乏深层次思考。对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比如大众传媒与公民社会建构的现实基础、具体模式、结构性要素等,缺乏严密的逻辑展开和详实的论据支撑。理论研究上缺乏前瞻性,就难以给实际运作带来及时的、强有力的指导。另外,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好的阐释和理解。比如在“公民社会”的理论框架下,新闻媒介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在建构公民社会层面有何特殊之处,与其他的社会组织有何不同?同样是在“公民社会”的视角下,民众既可能以“公民”的身份出现,也可能作为媒介受众的身份出现,这两者之间有何联系,是否可能转换?大众传媒在建构中国公民社会时是否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机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媒介伦理价值?这些都是大众传播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所必须深究的问题,当然,这也意味着这一问题的探讨还有十分广阔的学术空间。

参考文献:

- [1] Gordon White.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 [2] 俞可平. 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J]. 中国社会科学,2006(1):109-110;周国文.“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J]. 哲学动态,2006(3):58;李煜煜.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2):92.
- [3] 邓正来. 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 [4] 俞可平. 增量民主与善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94-195.
- [5] 何增科. 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9.
- [6] 李煜煜.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2):92-96.
- [7] 周国文.“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J]. 哲学动态,2006(3):58.
- [8] 邓正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知识治理制度的重构——民间传播机制的生长和作用[J]. 开放时代,2000(3):5-18.
- [9] 康晓光. 权力的转移——1978—1998年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J]. 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夏):45-62.
- [10] 王雄. 新闻舆论研究[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79-280.
- [11] 王勇. 公民社会与新闻传播[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4:10.
- [12] 陈赞. 试论“民生新闻”在构建“公民社会”中的作用[D]. 长春:吉林大学,2005:4.
- [13] 程粉艳,程刚. 新闻媒体与社会公正[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6):121-124.
- [14] 林夏竹. 在建构公民社会中我国媒体的角色定位[J]. 社科纵横,2005(2):188-189.
- [15] 张宏树,刘毅. 媒介素养与中国公民社会构建[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49-52.
- [16] 赵国臣.“网民”大国的公民社会理想和契机[J]. 青年记者,2008(3):27-28.
- [17] 孙少威,陈莉. 公民社会视域下的网络传媒[J]. 理论观察,2008(2):121-122.
- [18] [德]托马·海贝勒,诺拉·绍斯米卡特. 西方公民社会观适合中国吗?[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64-70.
- [19] 周国文.“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J]. 哲学动态,2006(3):58.
- [20] [美]唐(Tang, W. F.). 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171.
- [21] 展江,张金玺等. 新闻舆论监督与全球政治文明:一种公民社会的进路[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2.
- [22] 张天莉. 传媒治理的结构与过程——以西方电视媒体为例的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2006:4.